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微小细节同样构建着历史的图景

□ 连清川

1942年2月22日,60岁的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和妻子绿蒂·阿尔特曼,在巴西的寓所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双双自杀而亡。

此前不久,他向出版社提交了自己的遗著《昨日的世界》。他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好时光,感叹“欧洲已经自取灭亡”。

他和许多人一样,曾相信欧洲和世界已经踏入了终结战争的时代,人类剩下的只有美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他的迷梦之后,他开始和自己的朋友组建反战俱乐部,并在战后写下了一系列反战小说。

然而,他的一切努力似乎毫无意义。1934年,作为犹太人,他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国家,在英国、美国和巴西流浪。

茨威格死于绝望:对故去美好时光的依恋与无力改变人类命运的悲怆。

普通人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吗?的确,战争是普通士兵一城一池、一枪一炮打过来的。但是,战争往往是“大人物”发动的,德国人是在纳粹的欺骗之中,日本人是在对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中国人是在无奈的抗争之中,开始与结束了这场战争。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普通人又能如何改变世界?

不少人认为,世界史从来都是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诗经》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巅峰之作,但作者却大多佚名;秦朝和汉朝的工匠在秦砖汉瓦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但那是严刑峻法的要求,而非个人品牌的彰显;唐三彩走遍世界,郑和所携带的瓷器震惊了东南亚,但没有一个工匠因此名垂青史。在人类有记载的漫漫历史之中,普通人似乎更多只是历史的背景。

他们能改变什么?在纽伦堡大审判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的邀请,写作关于审判的报道,她在其后的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平庸之恶。

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审判中辩解称,他只是个普通人,并没有主动去发起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只是被动地执行希特勒和纳粹所颁布的命令,他只是个平庸的官僚。

然而,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却记载了历史的另一个面相——与艾希曼相反的普通人的故事。奥斯卡·辛德勒曾经是德国一个普通的企业主,在纳粹时代,他成功挽救了1100名犹太人的生命。

即便在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时代中,普通人仍然有着选择的可能性,他们虽不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却能够创造非凡的可能性。

辛德勒创造的奇迹其实并非个例。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主力多为万无一失的民用船,帮助运送了30余万名英法士兵;1942年10月,中国渔民在“里斯本丸”号行将沉没的关键时刻,救出了384名英军战俘……

那些英勇的士兵,在战火兵燹中无辜受难的平民,临危出现拯救危急的无名人士……这些微小的细节,同样构建着历史的所有图景。

大人物的确能够发起与终结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全面剥夺普通人所呈现出的顽强意志,以及他们在艰难中所选择的道路。哪怕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代中,普通人仍然能够作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茨威格在他的遗书中如此写道:“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我们或许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个体的选择,但回首看来,他的确有些过于性急了。再坚持3年,他就能够安详地度过晚年,并且经历人类历史上一段悠长的和平年代。

普通人或许只能在时代巨浪中沉浮,但避免平庸之恶,知晓世界变迁的善恶,在那怕微小的环境中制造向善的力量,就是在真正地改变世界,就是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河南红旗渠的青年洞景区是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林卉

铭记历史是前提,以史为鉴是目的。而实现铭记的深层意义,不仅在于留存历史事件的轮廓,更需要通过挖掘细节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进而推动对历史的传播与传承。现代口述历史肇始于20世纪中叶,伴随录音、录像技术的普及而发展,口述历史通过与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深度访谈,将鲜

脱离证据的“伪史”叙事能给文化自信加分吗

□ 林树心

近段时间,在微博、抖音、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一批炮制、传播极端“伪史论”的自媒体账号受到集中处置,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关注。这些账号所宣扬的内容,有的系统性否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等古代文明的存在,有的鼓吹“英语源于中国”“牛顿成果出自《永乐大典》”等奇怪理论,更有甚者将谣言扩展至近现代历史,突破公共认知底线,动摇主流历史观念。面对这样一股将历史娱乐化、虚无化的风潮,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历史认知?怎样的史观,才能支撑一个社会走向未来?

观察“伪史论”在网络上的传播方式

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内容借助看似新颖的角度和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吸引眼球、引发讨论。一些说法利用诡辩构建出表面“合理”的推理链条,在短视频、图解等传播方式的助推下快速扩散。但从学术标准来看,这类内容往往脱离必要的考据依据,缺乏逻辑的自洽性,极易造成误导性的认知。

在被平台封禁的账号中,不乏一些极端恶劣、荒谬的代表。譬如,被微博封号的“伪史论”大V“@墨者几何”,就曾借“考据”之名,炮制出诸如“马克思也是杜撰出来的”这种荒唐说法。这类言论看似“大胆”,实则全无依据,完全违背史实,不仅对青年群体形成误导,也已触碰近现代思想史的基本认知边界。将这种极端的虚构包装成所谓“冷门真相”,其本质不是知识传播,而是认知污染。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完全

脱离证据、逻辑和常识的“伪史”叙事,真的能给文化自信加分吗?它们在自我标榜“打破西方中心叙事”的同时,却在事实层面制造了更大的混乱,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情绪投射,最终使公共认知体系更加碎片化,反而削弱了我们构建自主历史叙事、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能力。这种“自说自话”的历史观,与其说是在塑造文化主体性,不如说是一种虚假的逃避。

更具讽刺性的是,许多“西方伪史论”的论证逻辑,其实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早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些欧美“民科”开始炮制诸如“金字塔是现代建的”“希腊是假的”等论调,甚至连中国的长城都不放过。这些反智论调在西方长期存在,虽然从未成为当地主流,却被某些人改头换面、涂脂抹粉后输入中国,无疑值得社会提高警惕。

历史记忆塑造民族精神



2025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当日,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中新社记者 洪波/摄

引导青少年用“三只眼睛”理性透视抗战史

□ 胡欣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很多青少年也获得了参与其中的宝贵机会,接受了深刻而鲜活的历史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青少年开展历史教育,既要引导他们触摸历史的温度、铭记民族的伤痛,更要教会他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过去,在历史的经纬中涵养健全的家国情怀。唯有如此,才能让历史的火炬照亮未来,培养出既扎根民族土壤又拥有世界眼光的新时代青少年。

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精神的DNA。勿忘国殇,实乃当务之急。对青少年而言,牢记历史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要通过细节的补充营造真实情境,“神人”历史。这种铭记,是对先烈的告慰,更是激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动力。

令人遗憾的是,囿于篇幅等因素的限制,中小学历史教材对抗战的描述比较粗略。仅仅以教材作为学习资料,学生很难真切感受到苦难的真实。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进行拓展补充,比如通过历史影像、幸存者口述、文物遗存等具象载体,让学生们

产生共鸣。有时候,与其强调几十万人的伤亡数字,不如讲述一个人的悲惨经历,更能让学生产生“现场感”。

值得一提的是,开展历史教育并非历史教师一人的任务。课堂之外,国旗下讲话可以少一些口号,多一些“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与今天的国际合作,让青少年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班团活动可以组织学生沉浸式参观纪念馆,设计“假如我是历史见证者”的角色体验等。

历史教育的高阶目标,是引导青少年跳出情绪的漩涡,以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历史与国家的关系,避免陷入“以恨代爱”的认知误区。现实中,不乏有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一提起日本就恨得牙痒痒,将历史问题与现实混淆在一起。如何引导这些“红了眼”的孩子学会正确审视中日之间那段不容回避的历史,笔者认为,需要打破单一视角,用“三只眼睛”透视历史。

“原告之眼”是情感的起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伤痛——控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缅怀数千万名遇难同胞,这是民族记忆的底线。但我们也应当让学生明白,铭记并非只为控诉,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警察之眼”则是理性的进阶。像警察侦破案件一样,引导青少年追问历史的来龙去脉,像偵探般剖析战争,总结经

验教训:日本为何走上侵略之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战争中的成败得失能为当下提供怎样的借鉴?“成事不足,败事之师”,不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然而,如果一味沉迷于探究与总结,也容易陷入“案件”本身而与跳脱视野。尤其要警惕陷入“实力至上”的误区——若将历史教训简化为“落后就要挨打,强大就能横行”,就会将人类社会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落入霸权主义的陷阱。

“法官之眼”则代表视野的升华。在“原告”和“警察”之外,“法官”的核心在于站在全局高度进行判断。同样,在审视中日历史问题时,也应引导青少年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理解: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日本侵略者在摧残中国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任何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胜利”,最终都会被历史反噬。“好战必亡”不仅是历史规律,更是人类文明的共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既要让他们看清历史的伤痕,也要教会他们带着伤痕走向未来;既要引导他们守住民族的根,也要帮助他们长出世界的眼。唯有如此,历史才不会成为仇恨的温床,而会成为滋养理性、孕育和平的土壤。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 王钟的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它不仅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更让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完成了精神涅槃。阅读1945年8月16日的《大公报》社评,至今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报人历经悲屈与苦楚之后的酣畅淋漓:“抗战胜利了,使流离播迁的人们人人能够快乐还乡,我们的胜利可算是胜利无缺了。我们以闻捷而喜,并为还乡而祝!”

宏大历史叙事背后,是无数人以血肉和筋骨撑起民族脊梁。民族危难关头,他们或直面枪林弹雨,毅然举起枪杆子保家卫国;或历经颠沛流离,在南行与西迁中,为中华传统文化保留一缕根脉。他们用最本真的行动,让民族的筋骨在苦难中愈发坚韧,让文明的火种在绝境里始终燃烧。

历史并不遥远,它藏在滇缅公路遗址上每一粒被血汗浸润的砂石里,刻在平型关大捷战场遗留的弹痕中,回荡在重庆防空洞墙上“愈炸愈强”的斑驳字迹间。当我们触摸历史的遗迹,便能读懂:《大公报》社评里的“还乡”二字,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回归,更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站起,向新生走去的总结。它让胜利有了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注解——所有的牺牲与坚守,最终都是为了每一个普通人能安稳地活着,能有尊严地回家。

爱国情怀并非抽象的口号。今年春天,笔者在云南瑞丽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看到这样的介绍:抗战危急时刻,3200余名南洋华侨毅然回国,从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南侨机工罗开瑞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国家危难时尽力作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他们中大多数人正值青春年华,却告别安稳的生活,驾驶着卡车在悬崖峭壁间穿梭,在日军轰炸下抢运物资,1000多人永远倒在“抗战生命线”上。这份跨越山海的赤诚,正是对爱国情怀最鲜活的注解。

民族气节并非石交易的筹码。北平沦陷后,国画大师齐白石闭门谢客,在门上贴出“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宁可挨饿也不向侵略者妥协。身为国防化学专家,面对险象环生,举步维艰的科研条件,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一边苦心钻研火药配方,期望以科研成果支援前线;一边利用自己的学识,在报刊上撰写大量军事评论,剖析战争局势,揭露侵略者的野心,激励军民的抗战斗志。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家长带孩子缅怀先烈,参观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传承爱国情怀。图为谢晋元雕像。

口述历史:让往事在流动中传播

活的个人记忆转化为可留存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疏漏与局限,更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可能。这种记录方式在与中国记述传统、现代传播技术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记录范式,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作为“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2015-2024年名为“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的总策划人,我有幸在过去10年中接触到近千个口述历史相关项目。其中,有的以口述历史为方法,记录家史、社区史、行业史;有的致力于挖掘大历史中的小切口,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现新的视角和群体;也有的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应用边界,将其与工业遗产、政策解读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相结合,创造出跨界融合的成果样态。除了项目数量的积累和领域的多元,

中国特色口述历史事业的进步更体现在议题的创新突破上。比如,在视角方面,更多关注、记录普通个体的生命史,让沉默的声音进入历史叙事;在应用方面,部分创作者将访谈资料转化为短视频内容,融入历史题材游戏素材、通识教育教学领域等,让历史记忆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公众;在伦理方面,强化对讲述者的心理照护、采访过程中的安全规范等,构建起更具人文关怀的实践准则。

研究者对于口述历史本体及作用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化,我个人近期思考的一个方向是:口述历史访谈在记录个体经历、感受与思想的同时,往往会触及另一个深层层面——某种集体意识亦即群体精神的汇聚。这一口述历史的深层价值,尚未在多数访谈中得到足够重视。

以今年上半年推出的部分口述历史相关成果为例:回望战争岁月的图书《苦难与信仰——最后的红军长征亲历者口述史》,反映新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建设的“7169部队口述史”项目、记录特定群体记忆的图书《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红旗渠口述史》《雷州青年运河建库开河亲历者口述史》《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立足记忆之场开展的“老艺人与新‘景漂’”访谈项目,融入访谈内容的文献展“流动世界——上海美术电影的时代记忆与当代回响”北京站……这些主题各有侧重的实践,既延续了口述历史的史料留存功能,又在当下语境中释放出独特价值。如何从中提炼出特定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精神内核”,是值得探索深耕的路径。

口述历史在实现记录历史的同时,还满足了社会记忆传播中多方面的需求。以我近期推进的“经典电视剧记忆”课题为例,在与主创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重温历史,了解那些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也能够随着创作者的讲述,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与创作氛围中,通过理解时代进一步理解作品,理解作品背后的创作初心与精神内核。创作者的记忆通过访谈“流动”到当下,与新一代观众产生认知碰撞,形成跨时代的对话。

与此同时,部分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已久的前辈在接受访谈后会主动表示:“你们的访谈给了我一个倾诉的机会”。这体现了口述历史对长者群体的疗愈作用;在个人生命史访谈中,部分受访者还谈到自

联合项目已取得实质成果,也为推动文明互鉴、拓展全球史学视野注入了更多中国经验。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建立在脚踏实地的研究积累上,而不是靠质疑别人、否定历史、制造幻象来获得。

就此而言,社会在面对“伪史论”现象时,采取行动的重点并非与之纠缠辩论,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这3件事:一是建设更高层次的史学研究体系,提升专业声音的可见性和传播力;二是推动公共史学表达,帮助普通人理解历史研究的逻辑与意义;三是让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有更多渠道获取真实、专业、准确,同时有趣味、有吸引力的历史知识,打下理性判断的底层基础。

“伪史论”的逆流也许不会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退,但它绝不可能主导我们的公共认知体系。只要我们持续夯实理性求证的学术传统,推动可信、可讲、可传播的中国历史叙述进入主流视野,那些靠煽动情绪和制造幻象获得注意力的内容,终将自行褪色。真正值得被铭记的历史,从来都是经得起推敲的;而真正走向未来的民族,也必定要从清醒、坚实的历史认知出发。

这些知识分子以风骨为笔,在乱世中坚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准则,让民族气节显露出不可折辱的硬度。

英雄气概并非刻意的表演。淞沪会战中,营长姚子青率全营官兵死守宝山城,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直至弹药耗尽仍与敌人展开巷战,除一人突围汇报军情外,数百名战士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誓言;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与日寇周旋于白山黑水之间,牺牲时腹中只有未能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抗战先烈对阵地的坚守、对信念的执着、对民族的忠诚,无时无刻不在闪烁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光芒。

必胜信念并非盲目的乐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土大片沦陷,有人发出“亡国论”的哀叹,但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以缜密的分析指明胜利的路径;在敌后的山林间,“小米加步枪”的工厂在持久战中不断壮大;在大后方的工厂里,工人们日夜赶制武器,哪怕只有一颗螺丝钉,也要为前线添一份力量。这份信念扎根于对民族韧性的深刻认知,源于对“团结起来就有希望”的坚定笃信,让他们在至暗时刻依然能看到曙光,最终将“不可能”变成了“必然胜利”的现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仍在持续,它不仅是历史上民族意识高涨、民族精神凝聚的高光时刻,也是现实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原点。从抗战中淬炼出的“团结御侮”精神旗帜,成为新中国处理内外事务的重要准则,也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镜鉴。抗战史还远远没到翻篇的时。那些在战争中形成的民族记忆,是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是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固防线。

回避战争带来的破坏与痛苦,既是遗忘过往——遗忘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那些为民族存续牺牲的生命,也是愧对当下——愧对我们正在守护的和平、正在践行的民族复兴伟业。唯有直面历史,才能让抗战精神成为照亮未来的火炬,指引我们在激荡的时代浪潮中坚守底线、勇毅前行。

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历史不是由孤立的“知识点”组成的,并非冰冷的编年记事罗列。它可能是祖辈藏在樟木箱底的一枚褪色军功章,可能是老家祠堂堂墙上抗日救国标语,可能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反复吟唱的那首《我的祖国》。这些具象的碎片,让历史从教科书的铅字里走出来,变成可感可知的生命体验,也塑造着我们对他国的认知,让我们读懂“我是谁、从哪里来”。

己在其他方面的经历,如社会变迁中的个人选择、行业转型期的坚守与探索,成为更广泛维度历史叙述的注脚;还有大量创作者谈到创作经验和感悟,比如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对时代精神与作品表达关系的思考,这些都是立足过去、服务当下的珍贵内容。

谈及口述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聚焦于资料的可信度,包括如何确保受访者讲真话、如何通过对照研究加强口述内容的严谨性等。这些讨论固然必要,但更应清醒认识到:在所有口述历史活动中,“人”永远是核心,“人的回忆”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在铭记历史、以史为鉴的路上,唯有带着对人的尊重,行走于调研现场,用面对面的访谈打捞鲜活记忆,通过一个个经历触摸历史肌理,才能让中国故事真正扎根大地,在时代与人心共振中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总策划)